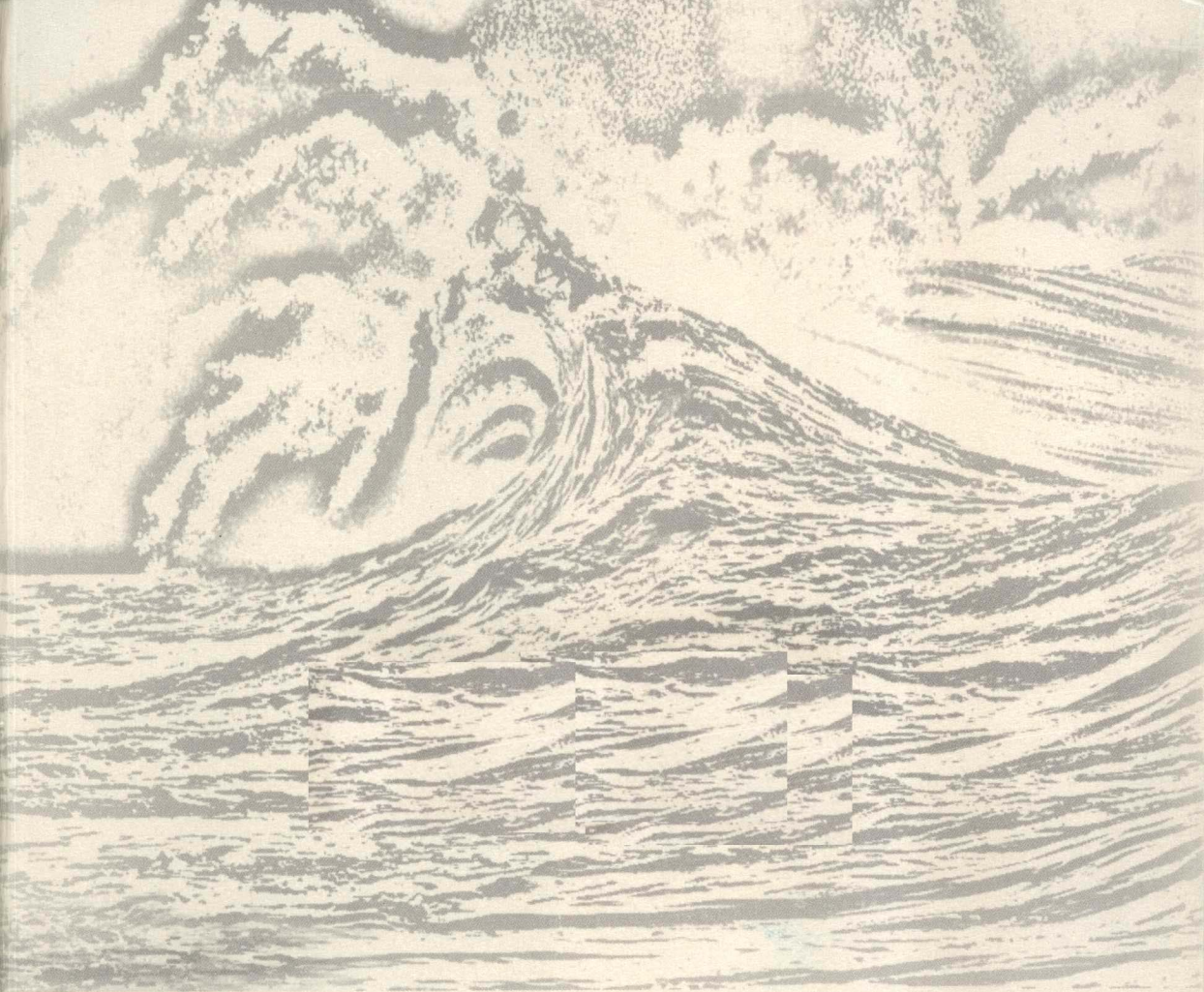




文学翻译的理论 与实践

翻译对话录(增订本)

许钧 等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中国文学翻译史承前启后的理论探索

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参照

文学翻译的理论 与实践

翻译对话录(增订本)

许钧 等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许钧等著. —增订本.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47-1056-5

I. 文… II. 许…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4188 号

书 名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
作 者 许 钧 等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56-5
定 价 3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再 版 序

时间过得真快,《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出版就快十个年头了。与这部书问世相关的人与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在我们这个浮躁的年代,文学翻译似乎成了一种很奢侈的追求,过去那些翻译大家所体现的精神和达到的水准好像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他们的丰富实践,他们的探索思考,他们的追求和影响,如今愈发显得珍贵。

翻开书,我忽然有一种伤感,为岁月无情而伤感:当年与我对话的那一张张或严肃、或深沉、或微笑的脸庞,不少已经与我相隔在另一个世界。伤感中,却也有一丝慰藉:与我有过心灵交流的那些翻译大家,健在的还在笔耕,还在翻译,还在不懈地追求;离去的永远活着,用他们以心血化作的伟大译作滋养着广大的读者,用他们融入了深刻思考的翻译思想启迪着翻译界的后人。

前不久,我到青岛去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项目评审,顺访了中国海洋大学,有幸与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重逢。我和林少华兄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改革开放早期引进国内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有不少是他翻译的,在影视翻译界很有影响。他翻译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更是为广大的文学读者所喜爱。他告诉我说,我撰写和编著的那些翻译理论著作,他最喜欢的是《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他说,这样的好书很少。他经常读这本书,觉得有关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书中都可以找到某种答案或某种思考线索,还说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带有根本性,值得不断探索。其实,林兄的这番话的意思,许多翻译界的朋友与我探讨翻译问题时,也常常说起。当初我承担教育部重点项目《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在《译林》杂志支持下,决定对国内不同语种的优秀翻译

家进行访谈,就文学翻译问题展开交流和探讨,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理论的层面,希望通过学习比较前辈优秀的译作,对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借助文艺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比较,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为我们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把握、处理好翻译中面临的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可资借鉴的手段,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好翻译中的基本问题,提供指导,同时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系统、科学研究,可以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另一个是在实践的层面,通过对谈、通过通信或以笔谈的形式,与翻译家一起交流,以问题为中心,以他们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他们在实际翻译中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对涉及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进而挖掘他们的翻译思想,总结他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为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指路。此外,我们也感觉到,这些优秀的翻译家都上了年纪,迫切需要及时地把他们宝贵的翻译经验总结出来,并在理论上有所升华,留给下一代。应该说,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了。《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出版后,两岸三地的译界同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翻译》、《中国比较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江海学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和《文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评介文章,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近十年里,该书为从事翻译研究的同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考的资源,成了译学界引用最多的参考书之一。

国内译学界对该书的重视,也促使我把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梳理和研究。我曾用法文撰写了《翻译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升华》的长文,发表在加拿大 META 杂志上,引起了国际译学界同行的广泛兴趣。如今看来,文学翻译虽然是最具个性的翻译活动,但其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有共性的,值得深入研究;理论问题虽然深奥,但只要与实践紧密结合,有针对性,有的放矢,对丰富多样的翻译实践就一定会有指导性。在这个意义上加以衡量,《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没有过时。其研究的方法,其探讨的问题,其总结的经验,其揭示的意义,反而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显示出更珍贵的价值。

前辈的精神对我来说,是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这些年来,我对翻译更加钟情,对翻译的理解也不断加深。有不少媒体的朋友、译界同

行,还有学生,愿意与我就翻译与文化问题交流看法,留下了一些文字。借《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再版之际,我对它们做了整理,一起收入本书。尽管新收入的篇什也都是围绕翻译的对话,然而它们并不仅仅涉及文学翻译,但考虑到如今的理论研究,常有与实践脱节的倾向,我想还是保留初版的书名,借此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许 钧

2009年6月29日

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传统与创新

——代引言

许 钧

中国文学翻译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时期,较为系统地译介外国文学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在这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的译家奉献了大量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为吸取外国文学养分,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增进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拿季羨林先生的话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在长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众多译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就译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对翻译活动、文学翻译的特殊本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近二十余年来,我国翻译界日益重视对这些宝贵经验和独特见解的整理和思考,一些译家和翻译研究、教学工作者还对文学翻译进行了理论探讨,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如王佐良的《论诗的翻译》、许渊冲的《翻译的艺术》、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和申丹的《小说文体学和小说翻译》等,为我们研究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能通过学习比较前辈优秀的译作,对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借助文艺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比较,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对我们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把握、处理好翻译中面临的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可资借鉴的手段,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好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同时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系统、科学研究,可以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在《译林》杂志编辑部的支持下,我们从1998年开始,在《译林》杂志上开辟了专栏,就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国内译坛的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通过对谈的方式

进行探讨,让各位翻译家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畅谈各自对文学翻译的独到见解和体会。三年来,我们有机会得到了国内数十位有影响的老一辈翻译家的支持,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鲜活的文学翻译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在对谈交流的基础上,对翻译家们的翻译经验、体会进行了梳理。一些老翻译家认为,通过对谈和交流,特别是通过思考我们在对谈中提出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翻译实践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在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与提高。可以说,对谈与梳理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经验体会向理论思考发展,传统的翻译思考不断得到丰富与创新的理论升华过程。

对我们来说,每一次对谈,都是向老一辈翻译家了解、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当面向老一辈翻译家请教,或通过一次次电话,进行步步深入的探讨,或通过通信,以笔谈的形式,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每次交谈前,我们都要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有关翻译家的翻译与翻译研究情况,搜集有关的资料,如翻译界对他们的翻译的评论,他们对翻译的体会与思考以及翻译理论界对他们的研究等等,通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针对每一个人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提出供他们进一步思考的具体问题。无论是面谈,还是笔谈,我们都紧紧围绕着这些问题,步步深入。可以说,最后展现在翻译界同行和广大读者面前的谈话录,是一一次次交流与深入思考的结果。像萧乾先生,他是在医院中与我们进行交流与笔谈的。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于1998年1月8日、2月1日和3月12日,先后三次在医院给我来信,谈他对翻译的看法。据他夫人文洁若说,当时,他因患心肌梗塞住院治疗,病情十分严重。但对翻译问题的探索,萧老先生非常重视,在病床上先后写了六页文字,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珍贵的文学翻译研究资料,更是一笔无价的精神遗产。又如叶君健先生,他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翻译家,他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伴随着新中国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作家陈丹燕曾将此书比喻为“我的圣经”。我与叶君健先生有过两次很长的对话,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一次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全国文学翻译座谈会后不久,确切的时间是在1996年11月3日下午,谈话后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日记。当时只知道叶君健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但从电话里听先生的声音很有劲,心想一定没有大碍。后来我听说先生患了绝症,住进了医院,心里一直挂念着他,也一直希望有机会就童话的翻译问题向先生请教。转眼到了1998年农历正

月初六,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打电话给先生拜年,顺便再提几个有关翻译的问题。电话是叶君健先生夫人接的,她得知我的意思后,说叶先生病得很重,连尾骨都碎了,躺在床上。我不忍心打扰他,急忙请夫人转达我对先生的问候,正想挂下电话,不料从电话那边传来叶老先生微弱的声音,问是谁打来的电话。当他得知是我去的电话,并想谈谈翻译问题时,叶先生欣然接过电话,与我谈了起来。他那平静的声音,充满智慧的话语和富有启迪性的翻译经验谈,尤其是他对年轻的翻译工作者的殷切希望,永远地铭刻在了我的心间。后来,萧乾先生走了,叶君健先生走了,赵瑞蕓先生也走了,他们的离去,是中国翻译界、文化界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在他们走之前,我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了有关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留下了他们对翻译的精辟见解与珍贵的经验。

三年来,我们选择了20位翻译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涉及的语种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在他们中间,有蜚声中外的文化大师,有独树一帜的语言学家,有成就卓著的诗歌翻译家,有文学研究成果累累的学者,有的长期担任翻译出版工作的领导,有的毕生从事文学翻译作品的编辑工作,有的对翻译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有的本身就是作家、诗人。在向这些著名翻译家请教时,我们充分考虑到他们的特点,从各个角度对翻译,特别是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淀。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这种复杂的活动中,无论哪个译家,都必然会遇到与上述三个活动过程相关的客观问题。不同的译家,虽然对文学翻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无法回避文学翻译的语言、艺术审美以及文学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方面所面对的基本问题,诸如如何对待原作,是“忠实”还是“再创造”?是致力于原作的文字形式转换的对等,还是寻求艺术效果传达的近似?是“异化”还是“归化”?翻译家如何处理协调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关系?如何发挥翻译主体的作用并保持客观性?如何认识文学翻译的目的、功能和艺术本质?如何衡量、评价一部译作的成功与否?对这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老一辈的翻译家们,在他们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思考。尤其对文学翻译中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他们都有着深

切的体会,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在文字、文学、文化等各个不同层次探索过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与手段。无论是他们的理论思考,还是翻译方法或技巧,对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启迪与指导意义。下面,根据交流的情况,我们结合译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将老一辈翻译家的有关思考与见解作一简要的梳理与介绍。

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翻译是什么?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恐怕都避不开这个问题。追究其中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两条:首先,回答“是什么”这个问题,仿佛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起点。研究物质,首先必须回答“物质是什么”;研究“文学”,必须回答“文学”是什么。翻开各种“概论”,比如“美学概论”,首章势必要谈“美是什么”,或者反过来问“什么是美”。其次,只有明确了翻译是什么,才有可能明确“翻译”的界限,明确翻译关涉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去加以探讨。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至少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考虑:一是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着重探讨翻译的本质;二是从翻译的目的或任务的角度,界定翻译是一项什么样的活动;三是从翻译的形式角度,看翻译有多少种类型。在与老一辈翻译家的对谈中,当我们涉及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他们往往从翻译的目的或作用这个角度,去看翻译是什么。季羨林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译林》,1998年第4期,第210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沟通,促进交流,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所在。对此,赵瑞蕻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国际文化交流,每一位真诚的译者的背上都有一个重担:只要天下存在着不同的人类社群,就必然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存在文化交流的需求。文化交流不仅能够促进不同文化的共同进步,而且在增强各国各族人民的友谊,保护世界和平,使人类免于战争,免于苦难,免于法西斯暴政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正如鲁迅在《捷克译本》中说的,人类最好不要隔膜,而应该相互了解。文学翻译正是构成文化交流的桥梁之一。”(《译林》,1999年第2期,第209页)明确了翻译的目的所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去探讨翻译的本

质。就其形式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的转换,但就其本质而言,翻译是意义的传达,是一种交流活动。就其根本而言,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递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十分正确的定位。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翻译确实起着推动文明进程的重要作用。季羨林先生以中华文化的发展为例,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译林》,1998年第4期,第210页)确实,在人类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中,翻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拓展它的生命,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去进行翻译实践,去处理在翻译中遇到的实践问题。同时,对翻译在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评价,也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翻译的地位,是对翻译地位的承认,这对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们来说,也无疑是一种肯定和鼓励。

明确了老一辈翻译家对翻译的目的、任务和作用的认识,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他们的翻译活动无疑是有帮助的。我们在学习巴金先生的译文时,发现巴金对自己的翻译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认为自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家。他说:“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

能还要重上战场。”(《译林书评》,1996年10月30日,第1版)在巴金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对他而言是一种武器,一种手段,是为了战胜黑暗,求得光明。他对翻译的认识,自然不只是停留在纯粹的文字转换的层面上。在与前辈翻译家的交谈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点:他们把翻译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工作去做,当我们问及他们为什么要做翻译工作时,他们的回答与我们年轻一代的回答往往是不同的。在特殊的年代,他们对翻译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对从事翻译工作也有着特殊的动机。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明确指出:“我从事翻译工作最初是为了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想通过翻译让读者了解反法西斯斗争的真实情况,从而增加中国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其次,我一向喜爱俄苏文学,因此也想通过翻译让中国读者欣赏到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丰富大家的精神食粮。我之所以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因为我认为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很出色的一个,尤其是继承托尔斯泰的传统,发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译林》,1999年第5期,第210页)在对具体作品的选择中,不少翻译家也始终把翻译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著名翻译家屠岸在回顾自己的翻译道路时,对我说:“我译惠特曼的诗,开始时是出于对他的爱好。我爱他雄浑、自由、奔放的诗风。对他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写的诗,尤其喜爱。我把译他的52首诗结集,以《鼓声》为书名,于1948年在上海自费(用‘青铜出版社’名义)出版。惠特曼是林肯总统和北方联邦政府的支持者。这部译诗集中有不少诗篇歌颂南北战争中北方的战士,歌颂林肯。而我的这部处女译著出版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我借它的出版作为象征:支持以延安为代表的北方革命力量,预示这场战争将导致全中国的解放。”从这些翻译家谈到的翻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追求,打着鲜明的时代标记。通过他们的谈话,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鲁迅要把翻译比喻为普罗米修斯,比喻为播火者。

二、对翻译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动机和目的直接影响着对作品的选择。考察中外翻译的历史,再结合我国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我们不难看到,还有许

多因素,对他们选择作家、选择作品加以介绍、翻译,起着制约的作用。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叫做“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苏联和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在那个时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主要根据“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标准,而在这两者中,政治是首位的。对许多翻译家来说,选择怎样的作品加以翻译,政治和思想因素往往是首位的。草婴先生先后花了20年时间,向中国读者系统地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他之所以选择托尔斯泰,首先是因为托尔斯泰有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其次是由于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魅力。叶君健先生翻译安徒生,是因为安徒生在他的作品中,“以满腔的热情表达他对人间的关怀,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对人类进步的颂扬。”(《译林》,1998年第5期,第201页)屠岸先生既是著名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出版经验的管理者。他在谈到影响翻译的选择因素时说道:“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与处理有很大影响,这是事实。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也是俄苏作品译本出版的黄金时代。当年欧美古典文学作品占一席之地,是由于我国文艺政策中有‘洋为中用’一条,同时,也可说借了‘老大哥’的光。苏联诗人马尔夏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俄译,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全部登载在《真理报》第一版上,战后出单行本,又获得斯大林奖金。所以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出版不会受到阻碍。法捷耶夫在《谈苏联文艺》一文中指出:‘欧美资产阶级在它发展的时候,也曾有过优秀的文学作品,但现在欧美作家与这种进步文学传统相对立,走向没落的道路……我们的文艺好像是联结点,我们吸取他们的好的成分,创作自己新的东西,再传给下一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外国文艺的政策上与法捷耶夫所代表的苏联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出版界对欧美的现代作品一概拒之门外。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后,对苏联的当代作品也当作‘修正主义’作品而打入冷宫。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以作家出版社名义)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过一批‘黄皮书’(用黄色纸做封面,没有美术设计),包括欧美现代作品和‘苏修’作品的译本,还出版‘内部参考’的刊物《外国文学新作提要》,以供有关领导和业务干部参考。‘文革’期间,一切外国文学译本,包括‘内部发行’的,都停止出版,内部参考的刊物也一律取消。‘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对外国文学译本出版的种种禁锢才被一一打破,迎来了文

学翻译的春天。”(《译林》,1999年第4期,第209页)方平先生有感于政治因素对翻译所起的负面影响,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偷偷摸摸做翻译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像《红与黑》、《高老头》、《复活》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莎士比亚在当时的命运还算好些,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称赏过,打狗看主人的面,不便抓出来示众。那个时候,除了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的作品外,外国文学都批倒批臭了;你却还在私下搞翻译,这不是在贩卖封资修的黑货吗?罪名不下今天的私贩大麻、海洛因。那时候我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只能偷偷摸摸,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小媳妇,夜半偷偷出去与自己以前的情人幽会,在那种紧张的心态下,可想而知,既没法谈爱情,也绝对搞不好翻译。当时的意识形态是在我的外国文学评论中留下了较鲜明的烙印。现在回过头来重读发表在揪出‘四人帮’后的一些评论,可清楚地看到,处在当时排山倒海的政治斗争的形势中,我还没完全被异化;良知还没完全丧失,可是在思想上且被压弯了腰,我私下写了些当时绝无发表可能的论文,自以为试图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不自觉地按照既定的政治调子、既定的模式,用当时那一套政治语言,当做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多么地可悲啊!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它用火和剑,强制你按照它的政治调子去思想,彻底剥夺了属于你个人的思维空间。”(《译林》,1998年第2期,第203页)

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国文学翻译的春天,老一辈翻译家们更是焕发了巨大的翻译热情。他们求真求美,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和艺术性。萧乾先生在选择作品时,特别强调必须“喜爱它”:“只是译的必须是我喜爱的,而我一向对讽刺文字有偏爱,觉得过瘾,有棱角,这只是我个人选择上的倾向。”“由于业务关系,我做过一些并不喜欢的翻译——如搞对外宣传时;但是我认为好的翻译,译者必须喜欢——甚至爱上了原作,再动笔,才能出好成品。”“从菲尔丁到里柯克,我译的大都是笔调俏皮,讽刺尖锐,有时近乎笑骂文章,这同我以‘塔塔木林’为笔名所写的倾向是近似的。”(《译林》,1999年第1期,第210页)著名文学翻译家文洁若有着自己明确的选择标准,她说:“我喜欢选择那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译。例如凯瑟琳·曼斯菲尔特的作品就给人以美感享受——语言美,情调美。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的《高野圣僧》,芥川龙之介的《海市蜃楼》和《橘子》,以及80年代去世的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短篇《地歌》和《黑衣》,至

今健在的水上勉的散文《京都四季》，大都是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表现力见称，表达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对日本作品我还有个标准或原则：着重翻译那些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作品，其中包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和三浦绫子的《绿色荆棘》。”（《译林》，1999年第1期，第210页）在新的历史时期，屠岸先生也有自己的标准：“我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有自己的标准：一、在文学史上（或在现代、当代舆论上）有定评的第一流诗歌作品；二、同时又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选择第一流作品，是为了要把最好的外国诗歌介绍给中国读者，把外国的‘真善美’输送到中国来；选择我喜爱的、能打动我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我才能译好。对生命力不能持久的畅销书，我不感兴趣。作为出版社负责人，考虑选题就应当更全面，视野更广阔。对入选原著的语种、原作者的国别，要扩大，时代的跨度，要延长。出版社推出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着眼，从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角度着眼，从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的要求的角度着眼。作为文学出版社，应当出第一流的、古典的和现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作品的文学性是第一选择标准。但有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其文学价值或许还没有定评，但对读者具有认识价值，也可列入选题。”（《译林》，1999年第4期，第208页）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不仅仅是译者本人的事，出版社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取舍的决定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因素往往左右着出版社对一部作品的选择。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了最为重要的标准。老一辈翻译家们在选择作品翻译时，虽然受着一些无法左右的因素的影响，但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的一些观点和选择标准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有着启迪意义的。

三、翻译的标准和原则

在翻译界，特别在文学翻译界，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那就是“翻译无理论”。不少人认为，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全凭译者个人的修养、领悟和表现力，没有理论可言，也谈不上什么标准与原则。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文学翻译作为一项实践活动，一项艺术活动，它不会是完全盲目的，其中应该有一些规律可循。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在与翻译家的对话中，有

意识地对他们在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一些个人原则或观点进行发掘、归纳与总结。通过交谈,我们看到,在他们长期的文学翻译实践中,翻译家们对如何翻译,如何更好地传达原著的精神,再现原著的风貌,实际上都是有着自己的主张或追求的。他们都认为,通过翻译,他们在实践中渐渐积累了经验,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有规律的东西。李芒先生认为,关于翻译的标准或原则,他“不管在翻译一篇作品之前,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多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主张”(《译林》,2000年第1期,第204页)。

在交谈中,我们发现严复在1898年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对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翻译理论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讨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的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对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个世纪以来,评说纷纭。我们知道,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深感自己的局限,感叹翻译三难“信达雅”,并对三难作了详细分析。的确,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翻译实践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罗新璋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实践的指导,严复的“信达雅”说之所以能遍播久时,原因正是它对翻译实践有着指导意义。叶君健先生明确指出:“衡量一部翻译作品的成功与否,要有一定的标准。我觉得,严复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达’、‘雅’,仍不失为比较切合实际、比较科学、比较容易掌握的翻译标准。我甚至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应该也是世界各国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的一个准绳,有普遍意义,可以适用于任何文字的翻译。根据我的经验,若在翻译中遵循这三条原则,辩证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能避免失误。”(《译林》,1998年第5期,第202页)

屠岸坦言:“我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始终信奉。这三者中,我认为‘信’是中心,是主导,也是关键。正如人生三标准‘真、善、美’,‘真’是根本,‘真’的内涵是‘善’,外延是‘美’。没有真,也就不存在善、美。信好

比真,达、雅是信的两个侧面。没有信,就谈不上达、雅。不达,就不能说信了。对读者负责必须与对作者负责统一起来。对雅,我的理解是对原作艺术风貌的忠实传达。”(《译林》,1999年第4期,第204页)

李芒对“信达雅”之说的看法是:“严复的三难说,在我国的翻译实践中起过积极的作用。惟‘雅’说,在这里可能做‘优美’解。‘优美’可指多数文词应如此,说来并不算错,但解释、理解和应用起来,可能会产生因人而异的结果。本来,译家如若水平高,这个‘三难说’特别是其中的‘雅’,并不会发生什么负面影响,但如若是初学翻译,或者译品较多但并不高明的人,就往往会对它加以片面的理解,在译文中一味追求他自己认为的‘雅’,有时反而会弄巧成拙。”“总的讲,‘信’不外是对译家的基本要求,‘信’包括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和形式中的风格;‘达’一般地说,文学作品的文章大都是顺畅的,译文当然也不应有佶屈聱牙的痕迹;‘雅’与‘达’虽同属于语言风格,但‘雅’与否和‘雅’的程度,在文学作品中却多有高低和浓淡之别。一律求之以雅,就可能在尺度上出现不够准确的偏向,如若苛求于严复的话,这恐怕能够算是一条了吧?我所说的可能发生负面影响,就指的是这一点。”(《译林》,2000年第1期,第205—206页)

郭宏安的观点也很明确:“在中国的翻译界,自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之后,又有‘忠实、通顺和美’、‘不增不减’、‘神似’、‘化’等说法提出,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很少有‘信达雅’这样可触可摸、可施可行的。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愚钝的想法,这种种的说法似乎都还或近或远地在‘信达雅’的树阴下乘凉。当然也有不少人想破此‘三难’之说,但看来是攻之者众,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开一两个缺口,整座城池却依然固若金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怕是‘信达雅’三难确是搔着了文学翻译的痒处。只要我们与世推移,对‘信达雅’之说给予新的解释,就会给它灌注新的生命力。”(《译林》,1999年第3期,第217—218页)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确实如郭宏安先生所说,简明扼要,具有操作性,但对其中的“雅”字的理解,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美”论:“‘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用英文来说,就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 指具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 指具有形美和音美的次序。”(《译林》,1998年第3期,第